

## 中国女性初婚、初育

### 年龄变动与人口控制研究

才多多

#### 一、资料来源及说明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是描述女性婚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控制人口出生的重要参数。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仅到1982年上半年)使中国第一次获得这方面的完整准确的资料。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及1988年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又提供了截至1987年的最新资料。平均初育年龄资料又比初婚年龄资料要少,只有1960~1982年的全国资料。本文从80年代女性初婚年龄下跌的新趋势谈起,进而分析几十年来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的发展趋势及初育间隔的变动情况<sup>①</sup>,由此提出缓解人口高峰、控制人口的一条有效途径——在保持平均初婚年龄的正常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初育间隔。

本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是:《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中国人口年鉴(1986年)》、《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国分册)》、《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

文中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是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

$$\bar{Y} = \frac{\sum_{i=15}^{49} (i+0.5)a_i}{\sum_{i=15}^{49} a_i}$$

其中: $\bar{Y}$ 为平均初婚年龄; $i$ 为年龄组; $a_i$ 为*i*岁组的初婚妇女人数。

表1中1978~1987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分性别初婚人口的年龄分布计算的。其它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数据是根据1982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相关分析依据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1982年各

地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同年各地区的各项经济、文化指标进行。

1960~1981年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采用李国经的计算结果<sup>②</sup>。

#### 二、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变动趋势及特点

解放以来,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平稳缓慢上升,由1949年的18.57岁上升到1979年的23.12岁,达到历史上的最大值,30年间上升了4.55岁。其中1949~1969年间上升较缓,20年间只增加了1.72岁,有些年份还略有下降。70年代增长较快,10年间增长了2.83岁,且无波动(见图1)。80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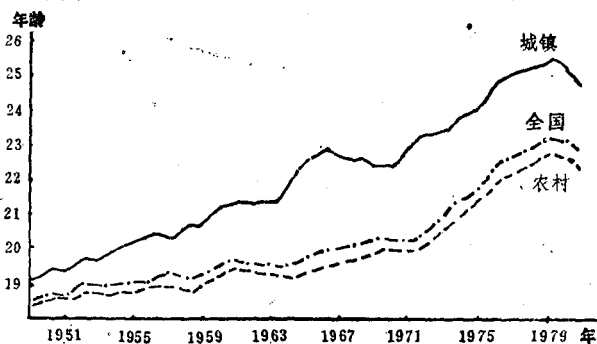


图1 1949~1979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变动

出现下降的趋势,止于1984年。接下来的3年几乎持平,1987年又明显回升。市、县的变化略有差异。市的下降比较缓慢,持续时间较长(6年),降幅为1.34岁,高于全国的降幅。县的下降较急,持续时间相对短些(4年),降幅为1.20岁,低于市的降幅(见图2)。

由此可以看出,80年代初期平均初婚年龄的下降并不象估计的那样严重,虽然降幅较大(在1.20~1.34之间),但持续时间很短,只有四五年。引

① 初育间隔指平均初育年龄与平均初婚年龄之差。

② 李国经:《我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动态分析(1960~1981年)》,载《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第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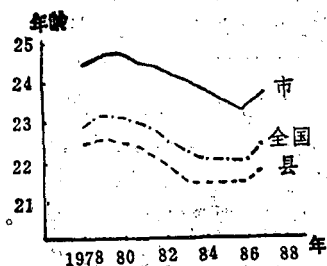


图2 1978~1987年全国及市、县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表1 同批妇女婚后生育第一胎(时间分布) (%)

| 初婚时间 | 婚后生育第一胎时间 |       |       |       |       |         |
|------|-----------|-------|-------|-------|-------|---------|
|      | 结婚当年      | 婚后第1年 | 婚后第2年 | 婚后第3年 | 婚后第4年 | 婚后5年及以上 |
| 1945 | 0         | 7.29  | 10.12 | 13.57 | 15.79 | 50.61   |
| 1960 | 2.07      | 20.57 | 30.94 | 23.81 | 9.18  | 11.69   |
| 1972 | 7.34      | 49.41 | 26.42 | 8.79  | 4.01  | 4.66    |
| 1981 | 12.10     | 61.34 | 17.16 | 4.71  | 1.51  | 1.30    |

起下降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新《婚姻法》规定的最低法定婚龄低于计划生育部门历年来执行的晚婚年龄造成的。我认为这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或一个方面，新《婚姻法》是1981年开始实施的，而平均初婚年龄1980年就开始下降，可见另有原因。70年代女性初婚年龄的快速上升主要受3个作用力的影响。（1）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经济因素的变动，尤其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就业情况和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变动；（2）70年代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过程；（3）十年动乱及上山下乡造成青年人生活不安定，择偶困难，婚龄被人为地不合规律地提高了。80年代初婚年龄的下降可以说是一种补偿性下降，当然也不排除工作放松的因素。

限于资料对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只能分析1960~1981年的变动趋势。21年间，平均初育年龄由22.0岁上升到24.2岁，共上升了2.2岁，低于同期平均初婚年龄的升幅。其中前10年升幅很小，只上升了0.4岁，后10年上升较快，由1970年的22.4岁上升到1980年的23.4岁，1981年初育年龄开始下降（见图3）。初育间隔越来越小，由1960年相差2.4岁到1970年相差2.2岁，至平均初婚年龄的高峰期的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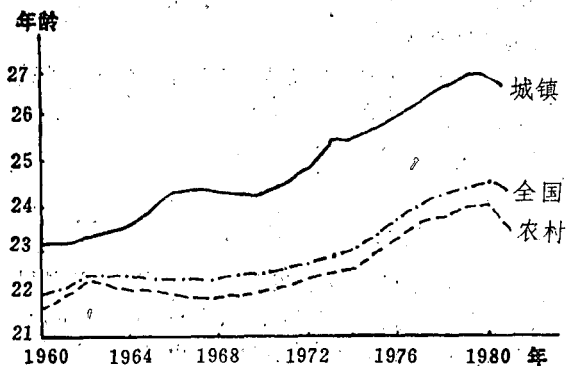


图3 1960~1981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变动

年则只相差1.1岁，即使在平均初婚年龄明显下降的1981年也仅相差1.4岁。

在初育间隔缩小的同时，初胎生育的完成年份越来越集中（见表1）。1945年初婚的妇女在婚后5年完成初胎生育的不足50%，1960年则为86.57%，到1972年达95.97%，以后便一直保持这样高的水平。婚后两年内即生育第一胎的比重也越来越高，1945年仅7.2%，1960年为22.64%，1972年达56.75%。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妇女几乎全部在婚后5年内完成了初胎生育，有2/3强的妇女在婚后两年内完成初胎生育（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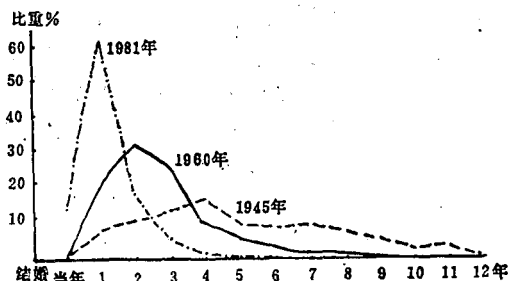


图4 三个年份同批妇女婚后生育第一胎时间分布

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未与初婚年龄同步上升是有原因的。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口号，实际上只在“晚婚”上下了功夫，“晚育”被忽视了。各种计划生育宣教中只看到“晚婚”和“少生”的必要及好处，很少看到“晚育”和“优生”的优点，在科研机构及资料情报部门，晚婚率、早婚率等与晚婚水平有关的资料伸手可得，而初育年龄、晚育率及早育率等表示晚育水平的数据则寥寥无几。在实际工作中，结婚登记时晚婚年龄卡得很紧，晚育则相对宽松，有些单位和地区即使规定了晚育年龄，也只是在晚婚年龄上加一岁。这种规定意义不大，因为

中国60%以上的妇女在婚后第一年生育第一胎。事实上,7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提高主要受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经济因素的变动和计划生育工作双重作用的影响,而平均初育年龄则只随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经济因素的变动而提高,这样初育年龄的上升幅度就低于初婚年龄的上升幅度,二者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纵观40多年来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轨迹及20几年间平均初育年龄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特点。即与其它人口现象相比,初婚、初育年龄的变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里的稳定不是指初婚、初育年龄恒定不变,而是说其运动方向稳定,几十年来一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波动较小。战乱、经济波动等社会经济因素的短期急剧变动对它的运动轨迹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曾在人口自然变动、人口生育率变动和人口迁移曲线上留下过明显痕迹。40年代的战乱曾使中国人口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形成了一个亚波谷,也曾造成人口的大迁移,却没有使初婚初育年龄发生波动;解放后战乱平息、经济恢复,形成了结婚热和出生热,人口激增,还使大量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但未能引起初婚初育年龄大的波动。60年代初期的3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急剧提高,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平均初婚初育年龄依然稳定上升。7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一度偏离原有轨道,有加快上升的趋势。但进入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又有回归的态势。

平均初婚初育年龄的变动具有这样强的稳定性,说明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促使它能排除各种干扰,按其固有轨迹运行。那么这种内在力量源于何处呢?我认为,主要决定于组成人口群体的个体本身的素质。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主要决定于人的身体素质,到了文明社会则更多地决定于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整个人口群体的思想文化素质决定了平均初婚及初育年龄的发展趋势。人口素质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短时期内的天灾、人祸、战乱及经济的大起大落可以增加死亡,扩大迁徙,甚至影响结婚人群总量,但人的素质不会激变。正是人口素质的持续上升决定了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的持续上升。

### 三、制约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变动的因素

首先分析初婚年龄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因素的制约。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

展极不平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特区,有经济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还有广大的内陆经济,及闭塞落后的西北、西南地区。将这些地区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就能从纵向上清楚地看到经济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从图5①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平均初婚年龄越高,相反,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平均初婚年龄越低。京、津、沪三大城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平均初婚年龄亦大大高于其它地区。云南贵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不足上海的1/10,平均初婚年龄亦低得多。总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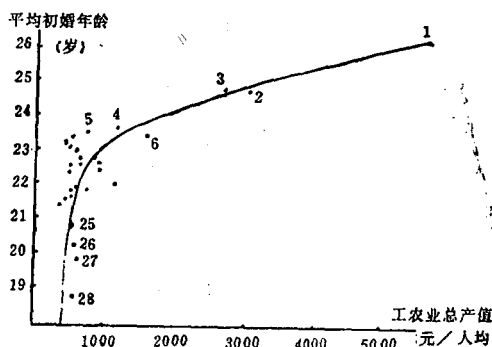


图5 人均农业产值与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关系

如此,但也有例外。如新疆、青海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较高,而平均初婚年龄却不高。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疆、青海是边远地区,国家投资较多,虽然产值较高,但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高。再如广西、福建两者平均初婚年龄较高,但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却很低,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是很强。经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700187。由图5的曲线变动方向可以看出,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它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较强,随着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经济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越来越弱。

(二)文化程度的持续稳定影响。中国各地区人口的文化程度差异也很大。以下分析全体人口的文化程度和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

图6和图7分别将全体人口、“初中及以上文化

① 图5及以下的相关图中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的是以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序的各省、区、直辖市,具体如下:  
1.上海;2.天津;3.北京;4.江苏;5.山东;6.辽宁;25.江西;26.甘肃;27.新疆;28.青海。

程度人数”和“文盲、半文盲占12岁及12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与各地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与平均初婚年龄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经计算，每千人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系数为0.707939，比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要强。图6明显地显示了这种线性相关性。与经济因素的制约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越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文化水平对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越强；越是落后地区，其影响越弱。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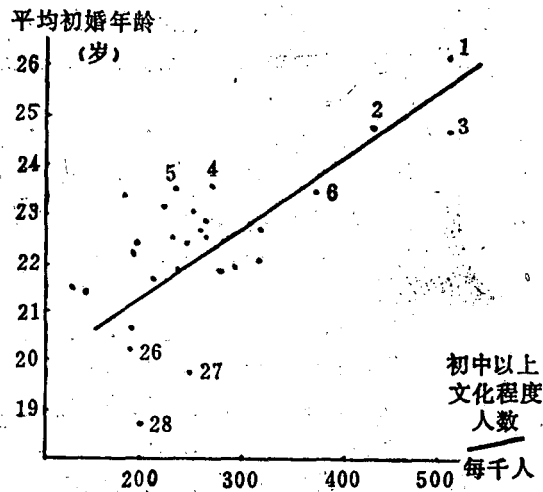


图6 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全体人口的文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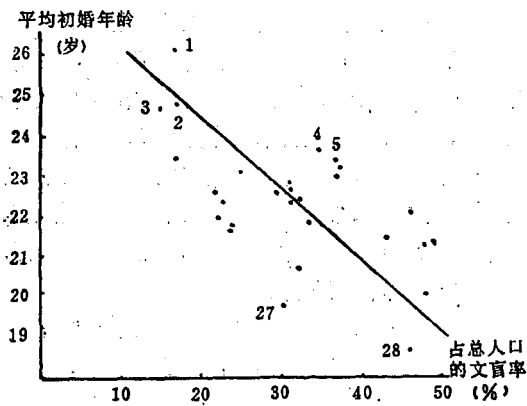


图7 女性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与全体人口文盲率

度对晚婚的作用力越来越大。从长远来看，文化程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稳定的、渐强的。

图7是文盲率与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图。经计

算，相关系数为-0.6104299，为线性负相关。即文盲率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低；文盲率越低，则平均初婚年龄越高。文盲率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力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弱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影响。另据有关数据计算，“大学毕（肄）业或在校人数（人/千人）”与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系数为0.5694005，其相关性要比以上2者弱得多。这是因为大学毕业或在校学生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毕竟很小，故影响力很弱。可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对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力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可替代。

图8、图9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图。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关程度明显地高于全体人口的文化程度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程度。经计算，育龄妇女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与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系数为0.7222236，为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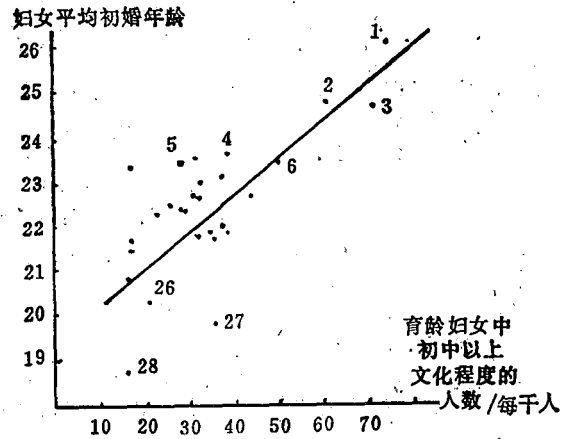


图8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育龄妇女文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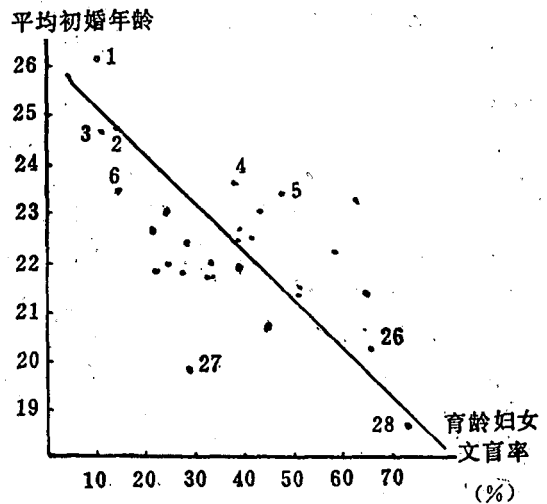


图9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育龄妇女文盲率

性正相关。这是所分析的诸因素中影响力最强的因素。育龄妇女的文盲率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相关系数为-0.6206356,是线性负相关。

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尤其是育龄妇女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对于晚婚有着举足轻重的制约作用。

(三)城市化水平的制约作用。历史资料(见图1、图2)表明,城镇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历来就高于农村,50年代相差不足1岁,到60年代末相差2.5岁以上,70年代相差2.5~3岁,80年代市与县平均初婚年龄差距又有缩小,相差2~2.6岁。1982年各地区城镇人口比例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对比见表2,二者具有较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1982年各地区女性平均  
表2 初婚年龄与市镇人口比例

| 地区  | 女性平均<br>初婚年龄<br>(岁) | 市镇人口<br>占总人口<br>比例(%) | 地区  | 女性平均<br>初婚年龄<br>(岁) | 市镇人口<br>占总人口<br>比例(%) |
|-----|---------------------|-----------------------|-----|---------------------|-----------------------|
| 上海  | 26.61               | 58.81                 | 四川  | 22.48               | 14.27                 |
| 天津  | 24.78               | 68.70                 | 广东  | 22.41               | 18.62                 |
| 北京  | 24.71               | 64.68                 | 安徽  | 22.24               | 14.16                 |
| 江苏  | 23.61               | 15.82                 | 黑龙江 | 22.07               | 40.14                 |
| 山东  | 23.47               | 19.07                 | 山西  | 21.88               | 21.01                 |
| 辽宁  | 23.46               | 42.36                 | 湖南  | 21.84               | 14.21                 |
| 福建  | 23.31               | 21.18                 | 陕西  | 21.82               | 19.00                 |
| 广西  | 23.17               | 11.83                 | 宁夏  | 21.63               | 22.49                 |
| 河南  | 23.07               | 17.32                 | 云南  | 21.55               | 12.95                 |
| 内蒙古 | 22.93               | 28.85                 | 贵州  | 21.44               | 18.92                 |
| 湖北  | 22.72               | 17.32                 | 江西  | 20.73               | 19.45                 |
| 吉林  | 22.69               | 39.63                 | 甘肃  | 20.24               | 15.34                 |
| 河北  | 22.68               | 13.69                 | 新疆  | 19.80               | 28.40                 |
| 浙江  | 22.49               | 25.71                 | 青海  | 18.75               | 20.48                 |

0.569509。由于中国城镇人口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人为的成份太大,不能客观反映现有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水平,所以上述相关系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二者的相关性。若排除这一因素的影响,相关系数会增大,估计会大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但不会大于文化程度与初婚年龄的相关系数。

影响女性平均初育年龄的因素也很多,但我们缺乏全国各个地区的初育年龄资料,不能作回归分析,只能进行推理。据有关分析,平均初婚年龄是影响平均初育年龄的重要因素,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9670<sup>①</sup>,呈强相关。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是影响初婚年龄的制约因素也都是影响初育年龄的因

素,只是这些因素对初育年龄产生影响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各种避孕手段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每个妇女都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生育时间。

以上各相关因素中,影响力最强的是文化程度,尤以育龄妇女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的比例最为重要,其次是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最后是城市化水平。但是,0.5~0.7的相关系数只表示了一种较弱的相关性,这说明,影响女性初婚、初育年龄的因素很多,但每一因素都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平均初婚、初育年龄不受短时期的社会经济剧变的影响,而只受缓慢的、持久的社会作用的影响,无论外部条件发生多么激烈的变化,它都顽强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平均初婚、初育年龄的平缓上升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识了这个规律,在确定最低婚龄和育龄时,不仅要考虑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还要考虑民情和人情,婚龄及育龄的下限要适应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最终会失去其应起的效力。即使通过强大的外力使婚龄和育龄超常上升,也不会长久,总会以更大的幅度回落,不仅干扰初婚、初育年龄的正常运行,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

#### 四、扩大初育间隔是控制人口的有效途径

“八五”期间是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全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0~29岁)的妇女人数年均1.2亿多,每年进入生育峰值年龄(23岁)的妇女为1200多万,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所以“八五”时期乃至“九五”时期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目前中国女性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的降低已超越现有经济水平很难再度大规模下降,只能在现有生育政策规范下,认真落实政策要求,减少政策外的多胎生育、早育和计划外生育,如果这些薄弱点都得以加强,生育率还可望有所下降。

在婚育年龄方面,我认为晚育是个薄弱点,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多做工作。这是因为:(1)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在计划生育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得到了足够的增长,很难再继续提高,如果强行使之超规律地提高不仅会干扰其正常运行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心理乃至生理

① 李国经《我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动态分析》,载《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第52页。

问题。相反,平均初育年龄的上升相对较弱,初育间隔连年缩短,尚有继续提高的可能;(2)以往在晚婚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多,成效也很大,现在可做的工作很少,只能在杜绝早婚上下些功夫。相反,过去我们在晚育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对少些,成效亦不显著,有潜力可挖;(3)晚育对控制人口、缓解人口高潮的作用是直接的。“八五”期间中国每年进入生育年龄的妇女为2300多万,若都推迟1年或推迟两年生育,就会大大缓解生育高潮期的压力,并对尔后的生育周期起到调节作用。相反,晚婚对控制人口的作用是间接的,是要通过晚育来实现的,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晚育;(4)从中国妇女的婚育心理来看,许多调查表明,广大妇女期望生育两个孩子者最多<sup>①</sup>。现有经济情况下的生育意愿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改变的,这是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难于继续下降的根本原因。调查表明,愿意在晚婚年龄结婚的人数大大低于愿意在晚育年龄生育的人数,“这种观念反映到人的婚育行为上就表现为动员晚婚比动员晚育要难”<sup>②</sup>。

综上所述,大力抓好晚育应该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那么延长初育年龄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首先,进行晚育有利家庭、有利孩子、利自身发展的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结婚即怀孕、结婚的目

的在于生育的传统观念及行为。

其次,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做好婚前节育、避孕知识的宣传和咨询工作,杜绝未婚先孕和未婚生育;二是抓好新婚夫妻的节育环节,减少婚后第二年生育的人数。

第三,建议计划生育部门将晚育年龄定为晚婚年龄加2岁。即法定婚龄为20岁,晚婚年龄为23岁,晚育年龄为25岁。这个年龄经过努力是能够为大多数青年所接受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25岁也是最佳生育年龄。初胎生育的推迟不仅改变短期的生育行为,还会减少2胎生育的机会,尤其是会大大减少多胎生育的机会(杜绝多胎生育正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关键点),由此降低生育率。

第四,利用经济、福利杠杆,限制早育、鼓励晚育。生育行为受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制约。我们要引进一些调节因素,利用经济、福利杠杆抑制早育发生,使广大育龄人群通过权衡利弊得失,自觉地选择晚育。

(本文责任编辑:郭汉英)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 ① 孙瑛《今日妇女生育意愿》,《人口学刊》,1988年第6期;
- ② 王殊《关于当前婚育观念变化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1期。

(上接第44页)

(三)调整企业结构、正确处理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适度规模经营。优化配置、合理组合、规模经营是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扩大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在沈阳市乡镇企业中已有一批企业在这次治理整顿中经住了考验。围绕这些企业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或兼并亏损企业、或组织乡镇企业集团、或增加从业人员,既可使先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批量生产,又拯救了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安排了即将再度过剩的劳动力。

对全市1989年乡镇企业职工部门构成中各部门增减百分数和各部门1988年人均总产值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二者成正相关关系( $r=0.8831$ ),显著性水平为0.05(不含建筑业)。对全市29个在1988、1989连续两年产值超500万元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增长速度和1989年人均企业纯利润进行相关分析表明,二者也成正相关关系( $r=0.4336$ ),显著性水平达0.02。这说明,劳动生产

率越高,经济效益越好的部门和企业,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越快。从业人员向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较高的部门和企业转移集中是一种规律性的趋向。

但分析的结果又表明,29个企业1989年人均总产值的发展速度与从业人员的发展速度成负相关关系( $r=-0.5544$ ),显著性水平0.01。这说明从业人员发展越快,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速度就越慢。从业人数过快增长要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正是企业生命力所在。从实际出发掌握好企业兼并、联合、吸收劳动力的“度”至关重要。规模经营也不是越大越好,而要适度。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值的规模扩大,不能说是规模经济。对于那些确实无法起死回生而先进企业又爱莫能助的企业,该关的就关、该停的就停、该拍卖的就拍卖,其从业人员该回归农业的就回归农业。

(本文责任编辑:朱犁)

(作者工作单位:尹文耀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  
李临洁 沈阳市乡镇工业管理局)